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话语、认知与社会的互动

The Cognitive Turn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nterplay of Discourse, Cognition, and Society

张小溪 /ZHANG Xiaoxi　　詹琰 /ZHAN Yan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49）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摘　要：批评话语分析（CDA）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已经通过对科技话语领域的应用而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在长期发展中与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其中与批评认知语言学（CCL）结合形成了“语言–认知”的研究范式。研究发现CDA理论与CCL相结合可以形成“社会–语言–认知”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话语、认知与社会三者的互动，弥补单一分析范式的局限。STS领域所关注的科技话语，目前尚缺乏一些CCL相关的实例研究，CDA的认知转向可能会影响已有的STS研究范式，呈现科技话语、公众认知和社会的三维互动关系。研究旨在分析这一转向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意义，并探讨其在STS领域的适用性。

关键词：话语分析　认知语言学　STS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n important research paradigm, has become closely linked 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ourse. Over the course of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this approach has intersected and integrated with various disciplines; in particular, its combination with 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CL) has formed a “language-cognition” research paradig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DA and CCL enables a “socio-linguistic-cogni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 analytical paradigms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scourse, cognition, and society. While the STS field, focus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ourse, currently lacks CCL-based case studies, the cognitive turn in CDA may influence existing STS research paradigms by reveal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on am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ourse, public cognition, and societ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hift and to explore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STS field.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STS

中图分类号：B842.1;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12.018　CSTR: 32281.14.jdn.2026.12.018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的经验，即意识中的世界经由语言建构。[1]人们通过话语认识世界，不同的话语建构了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话语分析逐渐走向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路径。研究话语，就是要探讨它们如何被作为“有效的工具”，实现对真实社会的重现，即对社会自身的建构、解构和再建构。[2]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能够通过网络接收和利用全球智识资源。[3]话语决定了大众的认知地图，塑造了大众看待世界的方式。[4]在认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日

作者简介：张小溪（1984–）女，湖北襄阳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Email: zhangxiaoxi19@mails.ucas.edu.cn

詹　琰（1973–）女，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传播。Email: zhanyan@ucas.ac.cn

知哲学的视角下，语境是真实存在的，认知则是物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统一体，语言作为二者的中介，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客观知识。早在20世纪70年代，马尔凯（M. Mulkay）就将科学话语分析应用于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中，揭示出“科学事实”如何通过背后的社会互动和修辞策略产生出来。[5]在STS的视角下，贝尔纳（J. D. Bernal）提出传播不仅呈现了某种现象，同时还通过话语建构了现象本身。[6]人们不但通过语言本身，同时通过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语言（如行动、交流、非语言符号系统、物体、工具、技术和独特的思维、感觉和信仰方式等）不断地、积极地建构并重建真实的世界。[7]

在建构主义哲学观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共同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福勒（R. Fowler）[8]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理论开始研究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80年代，以费尔克劳夫（N. Fairclough）[9]、范·迪克（Teun A. van Dijk）[10]和沃达克（R. Wodak）[11]为代表的话语分析学者开始关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实践。随着CDA的不断发展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增加，理论有效性得到验证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其中的不足，话语空间理论的提出者语言学家奇尔顿（P. Chilton）认为，从语篇的角度研究社会和政治活动，应该运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研究成果，识解（construal）内在认知机制，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联系提供联通媒介。[12]CDA强调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揭示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但对认知形成过程的识解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忽略了心理认知在语言和社会的中介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认知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传播中的风险沟通效果，[13]话语的再建构功能也取决于认知效果。基于此，在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产生了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CL）。通过梳理CDA的发展脉络后发现，识解话语对认知所产生的影响已经逐渐成为CDA研究的热点之一，至此，批评话语分析开始出现了认知转向，[14]本文旨在探讨这一转向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意义，并探索其在STS领域的适用性。

一、CDA理论的发展趋势

“话语”（discourse）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中的概念，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法国思想家福柯将话语分析看作是对“陈述”进行分析的过程，提出话语是对社会知识进行稳定限定（strongly bounded）的领域，通过系统性的阐述，使得人们认识世界。[15]费尔克劳夫批判性地吸收了福柯的观点，结合社会学思想提出了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研究话语建构的理论方法。（[9]，p.132）费尔克劳夫认为，话语既是表现形式，也是行为方式。人们通过话语来影响世界，并与之互动。不过，费尔克劳夫的分析框架与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符号学家所提出的符号任意性略有不同，他认为符号本身就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能指”与“所指”在社会影响下产生差异。因此费尔克劳夫的文本分析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语言学范畴，而与社会建构论结合在一起。他的文本分析从语言形式本身出发，研究词汇、语法与文本结构，并在话语实现层面剖析其包含的社会因素；吸收了阿尔都塞（L. Althusser）和葛兰西（A. Gramsci）等人的哲学与社会学观点，在社会实践层面剖析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费尔克劳夫的批评话语分析在话语分析解释–阐释的基本逻辑框架下，通过话语实现、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微观到宏观的分析。CDA理论分析具有动态性和辩证性的特质，并在后续发展中融合了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不同的流派，多数都关注话语背后的权力、操控与意识形态，侧重于“话语–社会”的研究路径。CCL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特定的学科与语言学相结合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并经由一系列的研究计划组成。认知语言学为其提供了语义学的新视角，增加受众对信息或者语言的识解过程，

在CDA的阐释功能之上作出了补充。

1. 2010–2020年：从发展到裂变

批评话语分析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话语分析沿袭国外的研究路径，有一定的滞后性。为把握国内话语分析的趋势，本文以CNKI为数据源，在学术期刊上使用“批评话语分析”为主题词检索到文献1638篇，发表时间和数量如图1所示。虽国外起步较早，国内直到1998年才出现第一篇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研究，次年出现对于费尔克劳夫三维话语分析理论的述评和引进。CDA理论在国内蛰伏十年才开始发展，并在2020年开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随着话语分析本身的发展和媒体的多样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细分流派，如对影视作品等进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16]对特定目标进行的语言学分析如生态语言学[17]和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18]等。这些研究并没有在研究对象上跳出对话语本身的关注，但由于其学科交叉的特征，在检索文献时有些内容并未纳入批评话语分析的范畴，如多模态实际也是把图形、音乐和视频等信息转化为某种“话语”，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析路径。这些实例研究极大拓宽了话语理论的应用场域，但并未脱离其“话语–社会”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结合时区分布，能更为清晰地呈现出相关主题的发展方向和流变，也能从时间尺度上发现领域的演化路径和研究重点的转变，如图2所示。

2000年左右，国内开始关注批评话语分析，该阶段以对理论的挖掘和探索为主，即批评话语分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批评语言学。在此之前，国外已经经历了对CDA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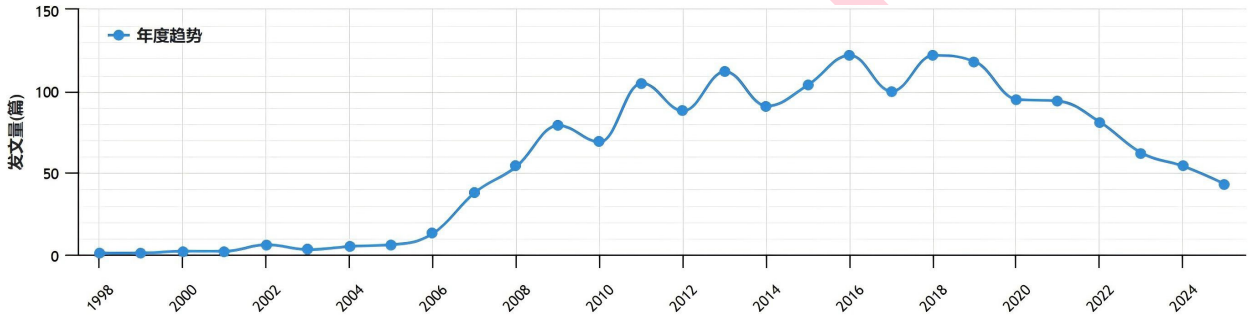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知网上CDA研究文献年度发文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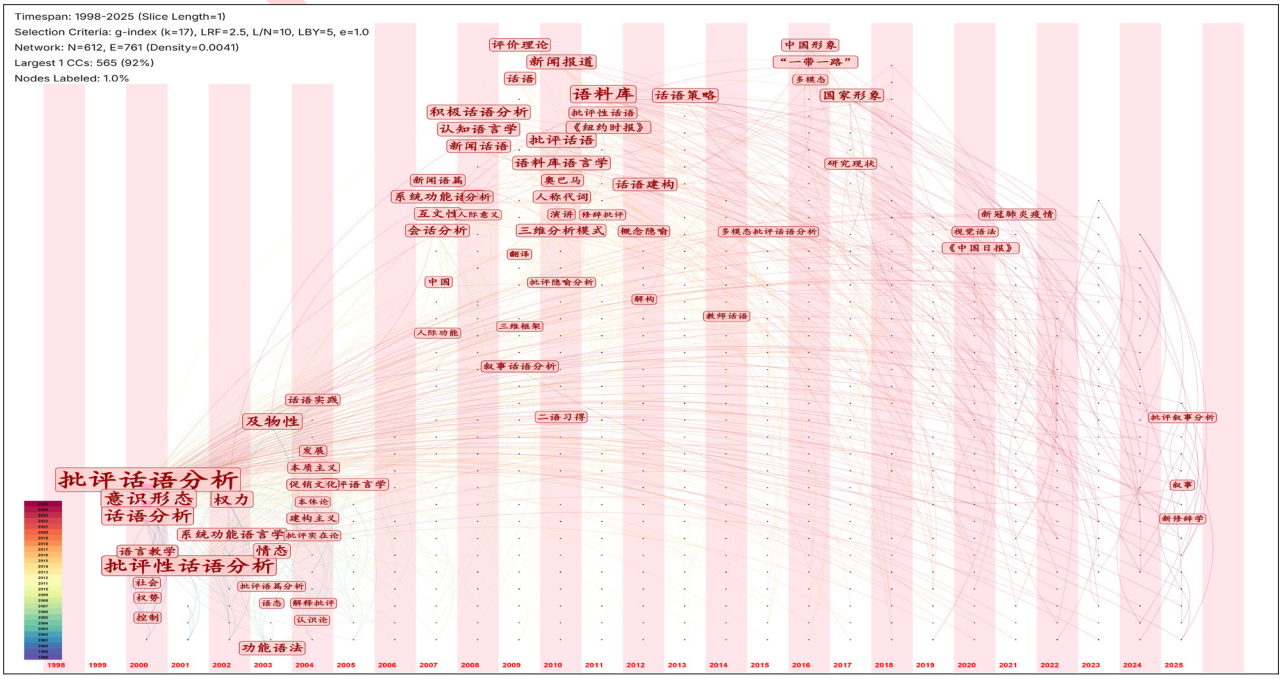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知网上CDA研究文献关键词与时区分布图谱

的质疑和辩护，质疑的方面在于分析的准确性与客观性。[19] 这种争议引来多种学科领域的关注和参与，CDA在质疑中不断调整和优化，形成了在国内接受度较高的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理论。为了解决初期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中的难题，如理论封闭、模糊的元素定义和不完整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划分，费尔克劳夫的分析范式从清晰的词语和句式入手，再通过对整体语言结构的解析挖掘语篇蕴含的内涵，最后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进行剖析。CDA从2007年开始繁荣发展，后期随着技术手段的迭代，语料库的出现改变了早期CDA依赖编码员手动编码的现状。语料库的使用拓展了可使用的数据集规模，学者开始关注主流媒体与政治话语，这与CDA的初衷相一致，即关注话语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关键词时间切片显示，在CDA理论爆发的同时，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与其产生了明显的交集，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即认知语言学。与CDA“话语–社会”的研究范式不同的是，CCL以“话语–认知”为分析路径，关注话语对认知的塑造和影响，以此完善了CDA理论所缺乏的、话语对现实建构的具体过程的论证。

2. 核心作者：关注CDA与多学科领域的交叉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几位作者在话语分析领域投入了长期持久的努力，如图3。

田海龙是较早接触话语分析理论的学者之一，在1999年从语境开始关注话语，到2010年引进话语这一概念。[20] 在其后的十多年中，逐渐表现出对费尔克劳夫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趣，2008年开始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争议进行评介和辩护，[21] 期间不断发表论文，论证了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并强调了话语研究的多学科与跨学科性，（[20]，pp.67–68）同时进行了丰富的实例研究，如政府工作报告、[22] 使用话语工具研究游客的身份建构[23] 等。其在2013年发现了认知科学对话语分析带来的影响，把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分为认知语境与认知话语两种分析路径。另一位与田海龙有合作的学者赵芃，也是最早引入话语分析理论的学者之一，以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法为理论基础，结合符号学理论资源，关注隐喻、互文性等话语的话语实践层面；后来逐渐聚焦于话语的社会实践层面，关注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24] 另一位作者辛斌2005年以两篇新闻报道为例，阐述了意识形态对于语言的影响，分析了语言如何被控制媒体的权力阶层所使用，在传播过程中强化其意识形态。[25]2006年，该学者已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话语研究的认知视角，认为认知语言学有丰富的理论应用前景，不仅涉及语法、语篇与话语分析，还有对文化与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认知语言学诞生于认知心理学等学科与语言学的交叉领域，天然具备跨学科的特征，可以借助神经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断丰富其研究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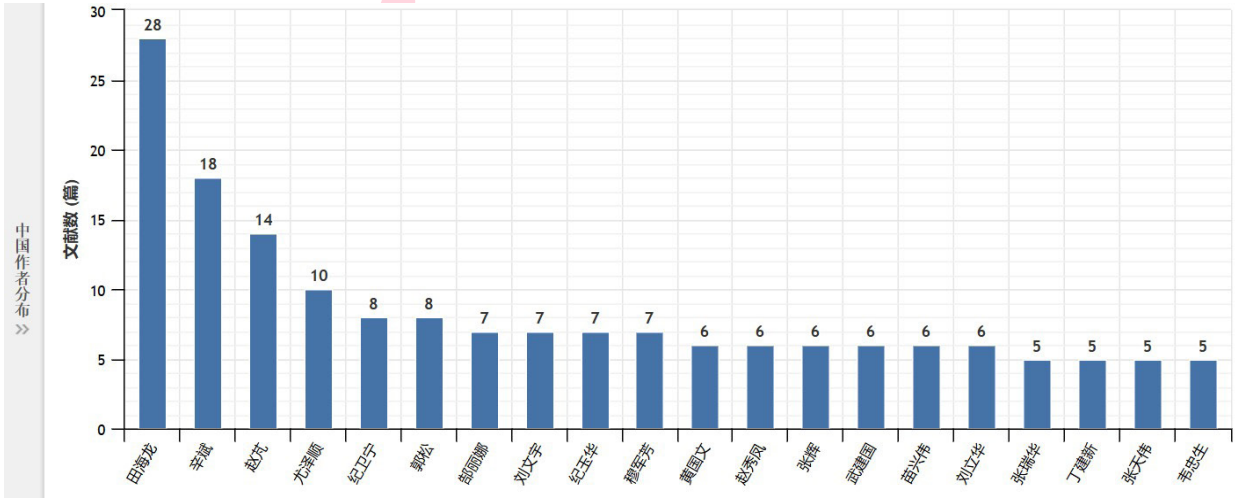


图3 CDA领域作者发文量

该学者其后发表多篇研究讨论话语分析可能的认知转向，认为CDA虽然关注了社会因素对语篇的影响，但忽略了语篇所蕴含的认知视角，批评话语分析应该采用社会学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26]

从核心作者的研究脉络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学者都在一定时期（2006–2010年左右）关注到了CDA与多种学科的结合，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同时，也拓宽了对CDA理论的应用范围。

3.学科融合：认知语言学

关键词能够直观地呈现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角，是对文献核心内容的提炼和概括。关键词的频率和共现网络能够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内容进行粗略的描述。在梳理CDA理论发展进程时，本文结合人工阅读整理，同时对每个时间节点排名前50的关键词进行了统计和计算。图4的节点大小代表出现的频次，连线代表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

图4显示，起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CDA理论对于语篇分析有很强的实际应用能力。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工具被使用，而CDA则关注语言为什么被这样使用，从而揭示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初期与“话语实践”“建构主义”与“社会”关系密切，而“叙事话语分析”则表明在这个时期CDA多用于对语篇的具体分析。“意识形态”是CDA的核心内容，对应与“权力”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值得注意的是，高频共现的关键词如“新闻报道”“互文性”“话语策略”都与具体的研究内容相关，只有“认知语言学”代表了一种新的学科以及新的研究范式的融入。“认知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法”的高频共现也表示两种理论已有较多融合，对应的“新闻语篇”则表示这种理论结合已经应用于实际的案例分析。

在实际的研究中发现，有学者从STS的角度，以话语分析为研究范式对科技话语进行了一些研究，探寻了新闻媒介如何通过话语建构了核电的安全与风险，[27]另有一些研究则将话语分析与科学决策相关联。[28]总体来说，CDA理论对科技话语的应用尚有较大空白，已发表的文献仅有23篇，几乎都基于文本并与科技政策或科技风险相关联，缺乏CDA理论及CCL理论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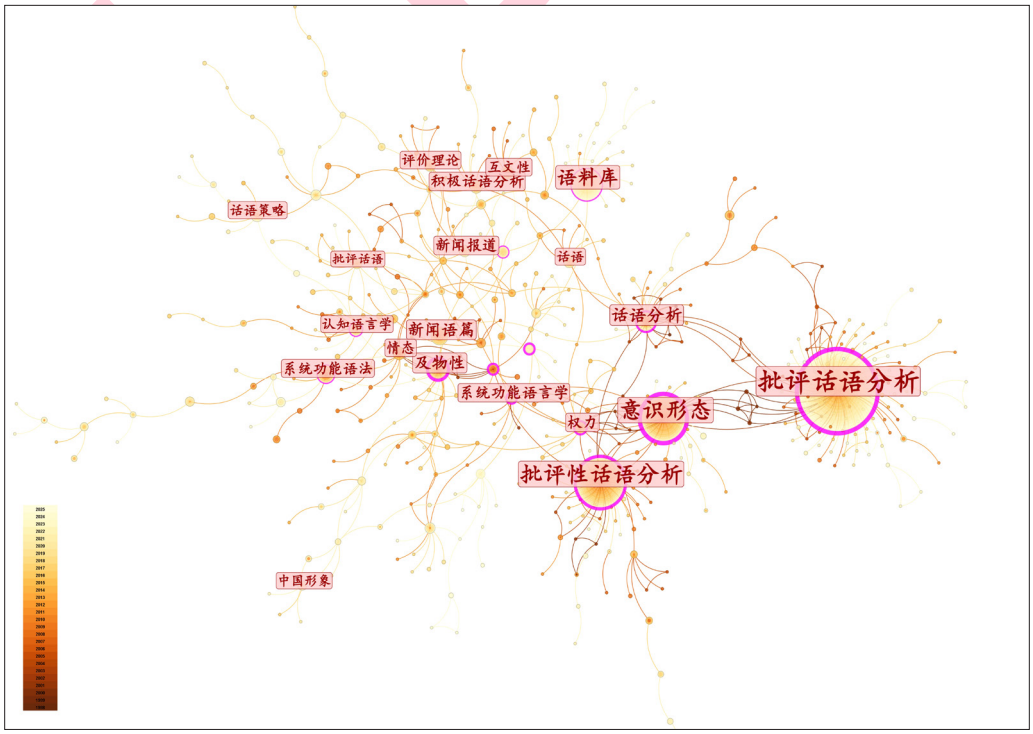


图4 CDA相关文献关键词CiteSpace共现图谱

二、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

CDA理论的发展历程显示，其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有学者认为话语研究已经从“批评话语分析”转向“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的研究范式，[29]后者从社会和认知两个方面阐释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思想上继承了社会学、语言哲学、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理论成果。CDA的先驱福勒和费尔克劳夫深受系统语言观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以社会性批判为主；而范迪克与沃达克则借鉴心理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关注认知在语言和社会建构之间的媒介作用。范迪克认为话语能够通过操纵和控制他人认知来改变他人思想，认知与社会又共同定义了语境。话语通过认知来表征社会，因此话语分析需要社会与认知的双重视角，[30]“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只有通过人的认知才能实现”，[31]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只有认知理论才能阐明。[32]

1. 传统CDA范式及其局限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困境是主观性（subjectivity）和过度解释（over-interpretation）。分析者本身具有的主观观念与异质性（idiosyncratic），加上语料抽取的随意性及局部性，可能导致实际分析中语料与共存文本（co-textual）语境和互文本（inter-texual）的脱离，带来了过度解释的隐患。随着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语料库的出现使得大量文本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但批评话语分析对认知维度的忽视却无法通过技术手段的迭代得到弥补，导致其难以解释话语如何通过认知机制影响社会行为。CDA的“话语–社会”分析路径看似完整，实际上对其中的媒介–认知缺乏关注，而认知本身是话语到社会建构之间重要的转译点。

2. 认知转向的理论基础

（1）建构主义语言观

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建构主义思想下的语言观。自18世纪的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家大多把知识视为不以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33]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则认为意义先于形式，形式只是用来指称意义。[34]而建构主义则与以上两种观点截然不同，认为语法识解经验的同时建构现实世界，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经由社会建构产生的叙事，人们通过语言思考和建构意义世界。在认知哲学的视角下，认知是物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统一体，语言作为二者的中介，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客观知识。也就是说，语言是重要的媒介，通过对语言进行研究，得以洞察思维背后的建构事实。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下，语言具有表征经验的功能，但经验中的各种范畴和关系并非是自然“赋予”的结果，语言并非被动反映经验，而是通过词汇与语法主观地建构各种范畴和关系。

这种视角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感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早在上世纪20年代，李普曼（W. Lippmann）就曾指出，媒体通过营造“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影响公众对社会现实的感知，这一阐述即为“媒介建构现实”的理论雏形。[35]1966年，伯格（P. L. Berger）和卢克曼（T. Luckmann）在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中，探讨了作为“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的社会是如何建构的，尽管该研究并未涉及媒介对社会建构产生的作用，但其思想启发了之后的媒介建构研究。[36]与此同期，格伯纳（G. Gerbner）提出了“媒体文化指数”（Media Cultivation Index）的概念，通过分析媒介塑造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主观现实”的影响，探讨了媒介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指出长期暴露在特定类型的媒体内容中会影响观众的社会认知和观念。[37]上世纪80年代，塔奇曼（G. Tuchman）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分析了新闻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指出新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新闻在与社会成员的循环互动中实现对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些研究带来了媒体研究领域和科学社会学领域的融合。[38]

（2）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社会学理论

建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之上的CDA传统范式，通过话语实现、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层层递进的结构关系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这套分析范式首先针对具体问题搜集对应的文本形成语料，从语言学角度对话语的文本特征进行分析；再利用修辞学等语言学工具箱对语篇进行分析，从结构上了解话语所蕴含的意义；最后，运用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揭示文本背后所表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形成从“话语”到“社会”的分析路径。批评话语分析从诞生之初即表现出学科融合的特征，这也促使CDA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范式。

（3）知识社会学与认知语言学下的话语分析

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知识包含着新闻这一类型。帕克（R. E. Park）将知识分为“熟识性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性知识”（Knowledge about），前者指的是通过直接经验或亲身接触而获取的知识，主要来自于具身性互动实践，即人们与某个事物、现象或概念的实际接触和经验，包含了个人经验和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中获得的理念。后者是指通过学习、阅读、观察等方式获取的知识，往往是系统化的抽象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对概念、理论、事实等的理解而获得的，它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关，不一定要求与事物进行直接接触，例如通过阅读历史书籍和研究历史事件可以获得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性知识。[39]

在帕克的观点中，认知架设了常识与知识之间的桥梁。在实际生活中，借助媒介对话语的加工方式和叙述手段将其转化为社会中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塑造了人们对特定主题的基础性认知；同时，媒介话语影响了人们对话语涵义的理解。此外，媒介通过建构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共同印象，为公众提供了现实的参照与行动框架，人们在媒介提供的“社会气候”（Social Weather）氛围中，形成对社会规范的认知，进而获得了共同的价值观，促进了社会共识的达成。媒介则通过对公众主观认知的建构，达到影响到个体行为决策的目的。

在知识社会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知识并不能直接成为常识，而需要认知与理解的参与和转译，如大学生与小学生，对“力”的理解和认知也是不一样的。因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开始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下，意识到“认知”在建构社会现实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3. 认知转向的核心内容与方法

认知转向后的批评话语研究并非是对CDA原有理论的简单补充，而是在研究重点上转向了话语对认知产生的影响，常见的研究范式基于以下几种理论：

（1）认知隐喻研究理论

认知语言学反对把隐喻仅视为一种修辞，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概念化的一种重要机制，隐喻不仅隶属语言学范畴，也隶属于认知范畴，本质上反映了两个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即通过原始域对目标域抽象结构的映射，通过对原始域的结构去理解目标域，隐喻是思维方式在话语中的表现形式之一。[40]认知隐喻理论研究语言处理中的认知过程以及语言与思维的交互关系，话语中的隐喻与转喻都能反映一种价值观和立场，[41]与之相对应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是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CMA），最早由查特里斯–布莱克（J. Charteris-Black）于2004年提出，主要目标是对传统语言学范畴内的隐喻现象进行认知方面的研究，认为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塑造了人们的态度和认知，进而影响行为。[42]汪徽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使用隐喻引导读者建构并固化心理模型，最终形成影响大众观点的社会语境模型；[43]刘文宇和胡颖则探讨了政治话语中的复合意象图示类型和隐喻机制；[44]伍青珠结合超语言学理论，探讨了巴赫金语言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指导意义；[45]孙毅和熊佳腾用这种研究范式探索了特定话语中的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46]武建国研究了话语如何通过使用隐喻维护自身的“合法化”。[47]这些研究为国内媒体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借鉴。

（2）心理空间理论

莱考夫（G. Lakoff）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本质上就是用对一种熟悉事

物的理解去接受另一种事物，通过这种“映射”方式实现概念域的转换。这种描述使人们对隐喻的作用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48] 在CMA的基础上，福科尼耶（G. Fauconnier）提出了“心理空间”理论，该理论在类比、递归、心理模式化和概念包、知识框架等心理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四维空间，把隐喻的理解过程视为这些心理空间的整合。这种“心理空间”理论促进了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研究范式的形成。[49]

话语空间理论的核心是对威胁的建构，即通过我方与他者之间的冲突产生胁迫，在面对这种胁迫时话语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话语空间理论强调话语实践中话语策略的重要性，通过话语策略，为话语的“合法化”进行辩护。[50] 在该理论中，合法化意味着通过话语营造一种正面、合乎道德、必要的感觉，而“非法化”则相反。[51] 趋近化理论在话语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借鉴话语历史分析法的思路，搭建出动态变化的话语空间，探究威胁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被建构出来，激发人们接受防范威胁的政策或措施，最初用于解释政治话语中推行某项政策的合法化和合理性，后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场景下的语篇分析。话语空间理论关注了话语的认知机制和语用维度，是批评话语分析范式的一种补充。

（3）趋近化理论

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是一种关注话语策略的分析路径。卡普（P. Cap）在话语空间理论基础上建构了趋近化理论，提出STA（Spatial-Temporal-Axiological）模型，[52] 并在之后的语料分析中不断验证其有效性。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展现了理论的强大阐释能力和广泛适用性，从政治话语拓展到公共话语，从话语策略拓展到形象建构，但还有部分应用前景尚未发掘，如对具体科技议题中的科技知识或科技实体进行的趋近化分析。

趋近化理论首先需要建构一种描述话语策略的三维量化模型，用于表示话语如何通过唤起指称外部实体对内部实体的威胁或压力，进而唤起内部实体寻求相应举措应对压力的机制，最初来源于卡普对伊拉克战争的话语分析，[53] 揭示政治话语如何通过话语策略建构合法性。随后，卡普发现了趋近化的价值补偿机制，[54] 即当某一维度的趋近化策略使用频率较低的时候，通常会增加其他维度的频率，从而引导公众关注内外部实体的冲突，以便为当下话语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些研究阐释了如何通过使用系统的、有预谋的语言操纵达到话语合法化的目的。

三、认知转向的实践应用及对STS的适用性

1. 政治话语中的策略选择

政治话语是该领域中最常见的研究对象。政治话语通过一系列策略，能够对其中包含的观点进行合法化辩护，从而强化受众的观点认同，帮助实现政治目标或增加公信力以及民意支持度。王正和张辉将心理学问卷用于批评话语分析中，计算读者对特定文本中趋近化策略运用的感知和反应是否存在差异。[55] 趋近化理论、问卷调查和语料库方法三者的结合使用，提高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阐释力和严谨性。王圣钊和赵秀凤借助Wmatrix语料库工具，探究了CSIS精英如何大量使用趋近化策略和隐喻等策略，不断进行舆论塑造，劝导公众认同和采取对抗性的态度和行动，将中国能源发展建构为极具威胁性的异类。[56] 这一研究使用了语义域标注工具Wmatri，启发了多种话语策略和趋近化话语策略的联动使用。

趋近化理论因其诞生于政治语篇分析，因而对政治话语的应用实例较多，如高鑫、孙冬阳从对哈萨克斯坦的2022年国情咨文的分析中，发现了话语中的趋近化和间离化；[57] 柯贤兵、邹诗倩研究了法庭调解员的话语；[58] 许爱玲基于中美《人权报告》语料进行了政治话语合法化的研究；[59] 李鑫研究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的疫情话语。[60] 类似的研究还有美国党争制度下的能源安全话语[61]、中西媒体中的中国

扶贫话语[62]、美国智库CSIS的涉华能源话语、([56],pp.60–78)美国总统大选两党辩论话语、[63]美国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的合法化研究[64]等。

2. 公共话语中的利益关系

随着CCL理论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公共话语也纳入其中，旨在揭示话语中包含的利益倾向或达到某种目的。这类研究通常从话语背后的利益关系探索其对公众认知的塑造。赵文佳对比了中美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和背后的影响因素；[65]黄林林研究了《华盛顿邮报》中疫情话语的威胁建构；[66]穆军芳、陈紫涵研究了社交媒体关于人工智能报道的趋近化策略；[67]姜卓函、[68]赵佟[69]研究了气候语篇的合法化；丁月研究了《纽约时报》对华为5G事件的报道；[70]吴霞研究了BBC和CNN有关新冠疫情报道对中国的污名化。[71]郑友奇、张圆圆从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视频演讲研究了国家形象的建构、[72]高春燕从《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上的疫情报道研究了国家形象的建构；[73]相似的研究还有日本核废水报道、[74]中美贸易谈判新闻话语、[75]世卫组织关于空气污染新闻话语、[76]慈善机构的话语、[77]外媒“618购物节”的相关报道。[78]周柏秀研究了中美主流媒体的新冠疫情相关报道；[79]栗明研究了中美抗疫机构的话语。[80]

3. 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塑造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应用CCL理论的研究尚不多见，主要利用其分析框架，探究语篇所创造的概念或其承载的意义塑造功能。如罗选民、曹韵之研究了朱自清作品《春》包含的话语策略；[81]方颖、俞东明分析了戏剧《维希事件》中犹太人遭受的威胁。[82]李妙对《贞观政要》的书谏语篇进行了认知分析；[83]曹曼、吴虹以华顿（E. Wharton）的短篇小说《另两个》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主角男权形象的建立。[84]

综上所述，CCL理论应用范围正从政治话语领域扩大到经济和社会文化话语领域，但在科学话语领域的实证研究还尚未发现。

4. 科技议题中的风险建构

现代科学技术产物由于其更高的技术复杂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快速渗透性等特质，使得公众在对其认知过程中包含着风险感知。公众既是新技术的受益者，也是技术风险的承担者，公众对新技术通常抱有相反的两种态度，两种态度都由公众对技术的风险感知引起，因此风险感知具有主观性。这种对新技术所包含的危险性的主观感知，即主体面对不确定因素时产生的威胁性感受。[85]马丁·菲什拜因（M. Fishbein）[86]提出了认知、情感与行为意愿的CAC模型（Cognition-Affect-Conation Pattern），该模型被大量应用于实证研究中，成为一种公众信息处理机制的分析工具。其中，认知与情感反馈构成了公众在看到相应议题时的风险感知水平，行为意愿则基于以上两点形成。也可以说，话语通过对其知识内容与情感投射的建构，影响了公众的风险感知，而风险感知又影响了公众的行为。

风险感知是公众对科技项目持有的主观判断，具有偏差性、主观性和放大性的特点，公众在风险感知的影响下进行行为选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媒体通过塑造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公众的实际决策和行动。STS的研究领域，一直关注科技议题中的风险建构和风险治理，如国外公众对智能机器人伦理的认知和态度、[87]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生产与消费、[88]国外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认知态度、[89]国内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态度[90]等。

目前已有的研究更多地从文本挖掘的角度进行认知分析，尚未出现以CDA或者CCL为研究范式的实践应用。与文本挖掘相似的地方在于，话语研究本身也基于文本，只是分析范式与文本挖掘略有不同，因而，若以CDA理论进行“话语–社会”层面的分析，辅以CCL理论的“认知–社会”角度，可以组成“话语–认知–社会”的话语分析工具箱，这种应用可适度弥补单一理论应用带来的局限性。

结　语

通过对批评话语分析相关文献进行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发现，1998年CDA理论引进国内后，持续了近10年的高速发展，并从2020年开始借助计算机技术，以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形式涉足多种信息领域，如图像、声音、画面等。在理论发展中，CDA与多种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其中与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相结合所形成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是重要的发展方向，领域内核心作者先后关注到这一方向，并做出了大量研究论证这一转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早期的CDA理论依托编码员人工编码，无法处理大量文本，限制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理论应用的普适性，后期文本挖掘工具的使用弥补了对大量数据处理乏力的短板，但分析者本身具有的主观观念与异质性，加上语料抽取的随意性及局部性，仍可能导致实际分析中语料与语境的脱离，带来过度解释的隐患。更重要的是，CDA对认知维度的忽视无法通过技术手段的迭代得到弥补，导致其难以解释话语如何通过认知机制影响社会行为。

与CDA“话语–社会”所不同的是，CCL沿袭一种“认知–社会”的分析范式。在这种模式下，话语的制造者与接收者不再隐藏在“社会”这样的框架之下，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话语”与“社会”之间产生的作用。这种以具体的人作为主体的视角，丰富了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的内涵，实现了语言结构与社会背景的联通。CCL的核心理论为“现实–认知–语言”的序列关系，认知是语言与现实的桥梁，语言反作用于现实与认知，考察语言的生成和理解，需要对认知过程进行识解。而CDA重视语境的作用，强调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理论的融合会形成“社会–语言–认知”的分析框架。通过阐释三者的相互作用，对原有研究路径是一种新的拓展。在当前的研究下，STS对科技议题中所包含的科技风险与科技伦理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其中不乏文本挖掘，目前该领域尚缺乏一些CDA与CCL相关的实例研究，CDA的认知转向和二者理论的结合应用可能会影响已有的STS研究范式，实现科技话语到认知和社会的三维互动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张学广.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观[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3（5）: 5–16.

[2] Lincoln, B.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yth, Ritual, and Classifi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3] 任定成. 社会中的科学技术 [N]. 北京: 中国图书商报, 2006–02–24（A08）.

[4]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 大众媒介与舆论 [M]. 郭镇之、徐培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26.

[5] Mulkay, M.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9.

[6] J. D. 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 [M]. 王文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3.

[7] 詹姆斯·保罗·吉. 话语分析导论: 理论与方法 [M]. 杨炳钧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2.

[8] Fowler, R. *Linguistic Critic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95.

[10] 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露丝·沃达克. 话语、政治、日常生活 [M]. 黄敏、田海龙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12] Chilton, P. *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5.

[13] 黄彪文、张增一. 从常人理论看专家与公众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差异 [J]. 科学与社会, 2015, 5（1）: 104–116.

[14] Hart, C. 'Event-frames Affect Blame Assignment and Perception of Aggression in Discourse on Political Protests: An Experimental Case Stud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6, 39 (3): 400–421.

[15]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16] 牛倩. 多模态话语分析下电影《长安三万里》字幕翻译经验与启示 [J]. 电影文学, 2025,（5）: 145–149.

[17] 周文娟. “和而不同”与生态语言学新模式: 融合与拓展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35）: 34–37.

[18] 侯松、吴宗杰. 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 理论·方法·展望 [J]. 东南文化, 2013,（3）: 6–13.

[19] Stubbs, M. W.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Ryan, A., Wray, A. (Eds.) *Evolving Models of Language: British Studi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2*[C], Clevedon: BAAL/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100–116.

[20] 田海龙、程玲玲. “Discourse”的含义及其汉译[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1（1）: 68–72.

[21] 赵芃、田海龙.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J]. 南京社会科学, 2008,（8）: 143–147.

[22] 钱毓芳、田海龙. 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3）: 40–43.

[23] 田海龙. 旅游研究的语篇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8）: 124–128.

[24] 赵芃、田海龙. 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4）: 9–17.

[25] 辛斌. 批评语言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意识形态观[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05,（5）: 7–10.

[26] 辛斌. 批评语篇分析的社会和认知取向[J]. 外语研究, 2007,（6）: 19–24; 110.

[27] 乔文艳、张增一. 核电安全与风险的媒介建构——基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核电报道的话语分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2）: 88–97.

[28] 秦雨辰、柯文. 话语分析与风险处置——以WHO对H1N1的处置为例[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 42（8）: 47–53.

[29] 田海龙、张迈曾. 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 语用学与社会学研究[J]. 外语学刊, 2006,（2）: 7–13; 112.

[30] 辛斌、刘辰. 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J]. 外语学刊, 2017,（5）: 14–19.

[31] 尤泽顺. 外交话语分析框架构建——以涉领土争议话语研究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5）: 22–34.

[32] 汪少华、张薇. “后真相”时代话语研究的新路径: 批评架构分析[J]. 外语教学, 2018, 39（4）: 29–34.

[33]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7.

[34] 饭田隆、古田智久、王亚奇 等. 日本的分析哲学（1933–2000）[J]. 世界哲学, 2023,（6）: 117–130.

[35] Lippmann, W. *Public Opinion*[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36] Berger, P. L.,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6.

[37] Gerbner, G., Gross, L.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6, 26(2): 172–199.

[38] Tuchman, G.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39] Park, R. E. *Essays in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40] 罗莉娅. 认知隐喻理论对雅思阅读教学的启示[J]. 海外英语, 2022, 468（8）: 63–64.

[41] 杨丹、李培培.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骑士文学作品中的花草意象研究[J]. 英语广场, 2023, 221（5）: 44–47.

[42] Charteris-Black, J.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3] 汪徽、辛斌、程儒雅. 新闻语篇中隐喻的建构作用研究——美媒“美国退出TPP”报道的批评隐喻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4（6）: 68–90.

[44] 刘文宇、胡颖. 政治话语中复合意象图式类型及隐喻映射作用研究——以卡梅伦的“脱欧”话题演讲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1）: 15–24; 146–147.

[45] 伍青珠. 超出语言学——论巴赫金的话语、体裁与对话[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29（1）: 48–57; 112.

[46] 孙毅、熊佳腾. 英国脱欧话语的批评隐喻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5（2）: 1–9; 137; 160.

[47] 武建国、谢思思、李晶. 政治话语“合法化”的批评隐喻分析——以美国政府发布的中美贸易谈判话语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4）: 111–122.

[48]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9]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0] van Leeuwen, T.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17, 11(1): 91–112.

[51] van Leeuwen, T., Wodak, R. 'Legitimizing Immigration Control: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J]. *Discourse Studies*, 1999, 1(1): 83–118.

[52] Cap, P. *Proximization: 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 Crossing*[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53] Cap, P. 'Towards the Proximization Model of the Analysis of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1): 17–41.

[54] Cap, P. 'Axiological Aspects of Proximiz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 42(2): 392–407.

[55] 王正、张辉. 三角互证视域下中西媒体中国扶贫话语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J]. 外语教学, 2022, 43（6）: 15–21.

[56] 王圣钊、赵秀凤. 基于Wmatrix的趋近化策略研究——

以美国智库CSIS涉华能源话语为例[J]. 话语研究论丛, 2022,（1）: 60–78.
[57] 高鑫、孙冬阳. 政治话语中的趋近化和间离化——对哈萨克斯坦2022年国情咨文的批评认知分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1）: 69–78.
[58] 柯贤兵、邹诗倩. 法庭调解中调解员话语的趋近化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6（4）: 69–76; 109; 161.
[59] 许爱玲. 趋近化理论视域下政治话语合法化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3.
[60] 李鑫. 趋近化视域下政治话语合法化的研究[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23.
[61] 赵秀凤、宋冰冰. 对抗与联盟: 美国党争制度下的能源安全话语[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1）: 54–66.
[62] 辛慧仪. 中国扶贫话语中的趋近化和间离化: 基于中西媒体报道的对比分析[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25.
[63] 单斯琴. 趋近化理论视角下美国总统大选两党辩论话语策略对比研究[D]. 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3.
[64] 吕湾. 趋近化理论视域下美国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的合法化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3.
[65] 赵文佳. 趋近化视域下中美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认知对比研究[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3, 28（3）: 183–191.
[66] 黄林林. 趋近化理论视域下《华盛顿邮报》中疫情话语的威胁建构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3.
[67] 穆军芳、陈紫涵. 趋近化视角下社交媒体关于人工智能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6）: 55–64.
[68] 姜卓函. 气候变化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的趋近化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3.
[69] 赵佟. 趋近化理论视域下气候语篇的合法化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3.
[70] 丁月. 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3.
[71] 吴霞. 趋近化理论视角下BBC和CNN有关新冠疫情报道对中国的污名化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3.
[72] 郑友奇、张圆圆. 趋近化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以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视频演讲为例[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5）: 37–48.
[73] 高春燕. 趋近理论视域下中美新冠疫情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22.
[74] 曾雪婷. 日本核废水报道的批评认知话语分析[D].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 2023.
[75] 杨文慧. 中美贸易谈判新闻语篇中语法空间认知模式研究[J]. 现代外语, 2023, 46（3）: 332–344.
[76] 王加林、刘如梦、韩金龙 等. 世卫组织关于空气污染新闻话语的趋近化研究[J]. 中国ESP研究, 2022,（4）: 10–20; 121–122.
[77] 杨向梅、徐亚妮、杨连瑞 等. 慈善机构话语的趋近化研究——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度报告为例[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22（1）: 1–8.
[78] 邱晋、苏欣. 从趋近化视角看中国青年网购消费倾向的转变——以外媒“618购物节”相关报道为例[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105–112.
[79] 周柏秀. 趋近化理论视角下中美主流媒体关于新冠疫情报道的话语对比分析[D]. 桂林: 桂林理工大学, 2023.
[80] 栗明. 趋近化视角下中美抗疫机构新冠疫情话语的对比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23.
[81] 罗选民、曹韵之. “趋近化”新探: 积极的话语策略——以朱自清的散文《春》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3）: 103–113.
[82] 方颖、俞东明. 从趋近化理论视角看戏剧《维希事件》中犹太人遭受的威胁[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1, 32（3）: 106–115; 159.
[83] 李妙.《贞观政要》中书谏的趋近化研究[D].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 2020.
[84] 曹曼、吴虹. 趋近化视域下《另两个》的话语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5（1）: 43–48.
[85] Camerini, A. L., Diviani, N., Fadda, M., et al. 'Using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to Predict Intention to Adhere to Official MMR Vaccin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Switzerland'[J]. *SSM-Population Health*, 2019, (7): 100321.
[86]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87] 罗傲、张增一. 国外公众对智能机器人伦理风险的认知与态度——基于Twitter相关话题讨论的质性分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4, 40（10）: 96–101.
[88] 迟妍玮、王丽慧、张增一.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J]. 科学与社会, 2023, 13（4）: 68–82.
[89] 罗傲、贾萍萍、张增一. 国外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认知与态度——基于Twitter相关话题讨论的质性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4）: 192–200.
[90] 黄楠、肖俊、张增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态度——基于新浪微博内容的文本挖掘[J]. 科普研究, 2021, 16（5）: 33–41; 100–101.

[责任编辑　李斌]